

学科主体性与问题导向：刘建军关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的教学理论建构与启示

Disciplinary Subjectivity and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Liu Jianjun's Pedagogy of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孙 霄 (Sun Xiao)

内容摘要：在全球化与智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刘建军倡导以“中国的外国文学”为核心的教学体系，为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自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引。其研究聚焦于如何突破长期以来西方理论范式的主导，构建具有中国立场与话语的外国文学学科模式。通过强化民族文化自信与学科自觉，推动从知识接受到主体性建构的学科转型，区分“原初的外国文学”与在中国转译、阐释而形成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并突显翻译在跨文化转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侧重问题导向下的思维训练，强化学生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将文本精读与文学史脉络相结合，以人文领域的新倡议系统化重构文学研究，避免技术融合导致的思维碎片化，最终达致从专业能力到人生智慧的升华。通过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详细解析，本文揭示“中国的外国文学”理论为新时期中国外国文学教育的自主化与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整体性方案。

关键词：刘建军；中国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学科主体性；问题导向

作者简介：孙霄，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Title: Disciplinary Subjectivity and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Liu Jianjun's Pedagogy of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Abstract: Amid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an intelligent society, Liu Jianjun advocates an education system centered on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 which provides a cruci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way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long-standing dominance of Western paradigms and meanwhile to construct a new disciplinary model f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discourse. By reinfor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disciplinary self-awareness, he promotes a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knowledge acquisition to activ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original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the latter being shaped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ithin China. This theory also highlights the key role of tran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raining by way of a question-oriented approach, it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capacity to discover and formulate critical questions. In teaching practices, it integrates close reading of texts with contextualized literary history, and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s literary studies with new initiatives in the humanities to avoid cognitive fragmentation induced by technological amalgamation, ultimately achieving a transition from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o life wisdom.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o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Liu’s theory of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 offers an enlightening and comprehensive solution for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new era.

Keywords: Liu Jianjun;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disciplinary subjectivity;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uthor: Sun Xiao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a (Xi’an 721028,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1312576481@qq.com).

文学作为跨越国界的桥梁，其教学与研究始终是一个民族文化视野与时代精神的深刻体现。在全球化与智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刘建军倡导以“中国的外国文学”为核心的教学体系，为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自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引。其研究聚焦于如何突破长期以来西方理论范式的主导，构建具有中国立场与话语的外国文学学科模式。通过强化民族文化自信与学科自觉，推动从知识接受到主体性建构的学科转型，区分“原初的外国文学”与在中国转译、阐释而形成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并突显翻译在跨文化转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详细解析，本文揭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教学理论建构为新时期中国外国文学教育的自主化与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整体性方案。

一、时代回应与主体建构：“中国的外国文学”之教学定位

刘建军关于外国文学教学的定位思想，其核心在于深刻回应时代的需求，并坚定地立足于学科主体性的建构。这一思想体系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由三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维度构成的有机整体。首先，它要求我们重

新审视文学的时代功能，突破传统“反映论”的局限，发掘其在智能社会背景下认识社会、预测未来的独特价值。其次，它倡导一种理论自觉，即通过区分“原初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的外国文学”¹，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桎梏，在文化自信的基石上构建本土化的阐释话语体系。最终，这一系列定位的落脚点，是明确外国文学研究的价值导向，即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通过文学教育增强文化自信，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接班人。以下将从文学功能的再发现、主体性的理论建构以及价值导向的最终归宿三个层面，系统阐述刘建军的这一教学定位思想。

（一）文学的时代功能：从反映现实到预测未来

刘建军认为“文学观念要从以往的‘审美功能’‘表现功能’转换为‘认识功能’和‘预测功能’的向度上来”（李维屏等 4）。文学不仅是反映生活与审美的载体，更是认识社会、预测未来的独特方式。他主张文学研究必须回应时代需求，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发现和解答新问题。这一观点超越了长期以来主导文学研究的传统反映论。传统的反映论将文学视为社会现实的镜子，固然有其价值，但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时，其解释力略显不足。尤其在当前智能社会背景下，技术迭代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促使传统思维方式向智能时代转变，这就要求教学打破固有局限，通过文学独特的形象化表达，深刻洞察社会发展走向并前瞻其未来图景。比如，我们在看到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时，不仅要看到主人公桑提亚哥身上所体现出的硬汉子精神和在困难挫折面前坚韧不拔的气概，同时更要从中认识到这一形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美国精英群体的鲜明特征。例如，在这个老人形象身上，既体现了美国精英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天赋使命感（打鱼似乎是老人的天赋使命——这其实是基督新教中的天赋论的体现），同时也表现出了美国精英们性格中所固有的固执和不知反思的特征。而这一切必然会使读者能更好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美国政治精英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再如，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可以看出，一个人不追求不进取不行，不断追求和永远进取是人的本质特征。因此，歌德极力肯定着人的这种积极有为的精神。但同时，歌德又告诉人们，人类前进的每一步，带来的并不总是好处，也伴随着新的困境或问题，或者说新的灾难。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总是两面性的。因此，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类追求进取的辩证精神。也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刘建军明确指出：“必须在坚持文学反映生活的基础上，强调文学用特殊的方式认识生活的功能（……）要看到它有着强大的认识社会和预测未来的功能（……）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更可能从情感和审美的运作中来发现未来社会中将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的期许”（“新

1 参见 刘建军：“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4（2023）：107-117+150。

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 5-6)。这体现了一种深刻的认识论逻辑：文学的预测功能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根植于其对人性深处与社会肌理的精准把握。通过构建虚拟世界、塑造典型人物、展现情感冲突，文学作品得以将现实中潜藏的趋势、矛盾与可能性放大并推演，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洞察未来的棱镜。

也就是说，刘建军认为文学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动态阐释，并非机械套用历史规律或其他学科结论。这一阐释过程高度依赖于研究者的主体能动性。正如他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社会的作用是依靠批评家和研究者的体会总结出来的，因此必须根据与时俱进的现实实际，来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阐释。这意味着文学教学的核心任务，不仅仅是传授既定的文学知识，更是要培养学生具备这种敏锐的阐释能力，使他们能够主动地、创造性地将经典文本与当下现实相连接，从中发掘出对当下及未来具有启示意义的思想资源。

（二）主体性建构：“中国的外国文学”之理论自觉

建构“中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其核心在于立足主体性。刘建军创造性地提出在洞晓“原初的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应将我们讲授和学习的外国文学，视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即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¹这一理论区分了“原初的外国文学”（域外原生产品）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经翻译与本土化再造的文本）。刘建军将前者比作“母文本”，后者则是经过翻译者再造的“子文本”，“子文本”已然不是“母文本”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它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转译与价值重塑。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被置于全新的语言文化语境中，其词汇、意象、典故乃至潜台词都不可避免地重新编码和解读，从而成为一个既携带着“母文本”基因，又融入了对象国语言文化血脉的全新生命体。外国的文化因素和中国的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形态”，其实就是文学领域的“中国化”的成果。²

这一区分标志着中国学界对外国文学的认识，从过去仰视、追随的他者视角，转向平视、对话的自我组成部分。即我们不再将外国文学视为一个固定不变、需要被动接受的权威范本，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可以与之进行平等交流、并能从中汲取养分以滋养自身文化发展的对话者。因此，今天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必须把审视的眼光转到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关注上来，找出不同的文学所包含的以往的文学艺术精神与今天的现实精神的“契合点”，从而揭示出积极向上、追求进步、具有人类共有价值之所在，并

1 参见 刘建军：“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教育》2（2023）：3-12。

2 参见 刘建军：“关于‘中国化’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兼论外国文学乃至具体学科‘中国化’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18）：1-11。

以此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¹这意味着,我们的阐释并非狭隘的解读,而是在深刻理解不同文化的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发掘那些能够跨越文化界限、引发普遍共鸣的共有价值。这种阐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它将外国文学资源内化为构建自身文化主体性、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积极力量。

(三) 价值导向: 强化文化自信

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最终价值,在于其深度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这并非一种功利主义的工具论,而是将文学教育视为涵养民族精神、塑造文化品格的重要途径。通过系统而深入地解读和研究世界文学的瑰宝,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参照系中审视自身,从而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有效强化文化自信,并培养出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坚定文化立场的新时代接班人。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彻底打破长期以来禁锢我们思维的西方中心论。这并非意味着要排斥西方文学,而是要摆脱对其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的路径依赖,转而通过强调“中国的外国文学”的主体性,推动学科从被动的理论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本土话语体系构建者。刘建军为此呼吁:“把审视的眼光转到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关注上来”(“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8)。具备自觉的‘中国意识’,还可以在研究中洞悉国外学者的某些学术偏见和谬误,提出中国学者独到的见解。²这标志着一种研究姿态的根本转变:从单向度的仰视学习,转向平等互鉴的对话与比较。在全球化与智能社会的双重挑战下,通过文学教育来强化中国价值观的主体性,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与此目标相应,教学范式也必须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的深刻转型。一个只会复述西方文论的学生,即便知识再渊博,也依然处于思想上的依附状态。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因此,教学的核心任务,应是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而非灌输任何固定的结论或现成的答案。刘建军认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现在我们的教学大纲总是强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9)。这标志着教学目标正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向对高阶思维能力的全面激发,旨在培养出能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善于创造的未来文化引领者。

二、问题导向与创新范式: 教学思想体系的内核构建

如果说主体性定位是刘建军教学思想的基石,那么问题意识便是驱动其

1 参见 刘建军:“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教育》2(2023): 3-12。

2 参见 刘建军:“‘中国意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关键所在——以《拜占庭: 东罗马帝国文学史》的写作为例”,《外国文学研究》5(2024): 19-23。

教学体系运转的核心引擎。这一思想体系并非孤立的教学技巧，而是一套完整的、从认识论到方法论、从课堂实践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创新。它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思维训练，探究思维模式，深刻地重塑了外国文学教学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

（一）从知识传授到思维训练

刘建军教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在于实现了从传统知识传授向现代思维训练的深刻范式转换。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获取已不再是教育的唯一难题，如何筛选、整合、批判并创造知识，成为更为关键的挑战。因此，他认为，外国文学教学需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通过文本分析训练思维，而非灌输固定结论。这一转换意味着，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被点燃的、能够主动探索的火种。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构建了一套完整而富有活力的教学理念体系，明确提出课程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而非被动接受既有的知识体系。这种对提问的强调，是对传统教育中标准答案崇拜的根本性颠覆。他进一步指出：“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所谓‘分析’‘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9）。

这一体系以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能力为根本目标，其具体内涵包括诸如提出问题是所有后续研究的基础；通过表象来深入认识事物本质，譬如通过《堂吉珂德》中两个主人公形象的对比深入挖掘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象征性表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用概念去套说现实现象；辩证地思考以理解矛盾双方的联系与转化。刘建军认为：“假如我们的学生能够具备四大能力并能将其有效地结合运用的话，假以时日，他们很多人将会成为一个富有智慧的人”（“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10）。这不仅是应对智能社会挑战的教学策略，更是在新的国际变局中，建立中国话语体系、培养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二）以问题导向推动文本解读

为实现从知识传授到思维训练的范式转换，刘建军主张在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中实现从知识型向问题型的根本转换，其核心路径便是通过质疑和反思经典文本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传统的作家生平——作品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模式，虽然条理清晰，却极易将鲜活的文学文本肢解为僵化的知识条目，遮蔽了文学最动人的情感与审美特质。为打破这一桎梏，他特别强调，教师应该教会学生学术性阅读和问题性思考，并以《哈姆雷特》《浮士德》等经典作品为例，展示如何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度质疑和探究。

这种教学理念的精髓在于，它将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建构者。例如，在讲授《哈姆雷特》时，教学的重点不再是简单地告知学生哈姆雷特的忧郁与延宕，而是提出一系列层层递进的问题，诸如哈姆雷特的忧郁和延宕仅仅是性格缺陷，还是对丹麦腐败政治环境的深刻反思？“生

存还是毁灭”的独白，在何种程度上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通过这样的问题链，学生被引导着深入文本的肌理，去触摸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去辨析思想观念的微妙交锋，从而在探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因此，刘建军旗帜鲜明地反对“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的机械套路，主张以问题意识引领文本分析，聚焦情感与审美价值，改变以往那种文学史教材中的作品讲授模式，集中精力去分析文本的情感特点以及在审美中体现的思想价值。¹这种以问题驱动的探索性学习模式，不仅让经典文本在当代课堂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真正训练了学生的思辨能力，使其学会如何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如何在复杂的信息中形成独立的判断。

（三）中西思维模式的探究

刘建军的教學思想建立在对中西思维模式深刻差异的精准把握之上。他并非简单地罗列文化现象，而是深入到文明的不同思维内核。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属性’来自阴阳为本的变化学说（《周易》讲述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种思维中强调的是矛盾的联系与转化，强调的是‘中庸’，是‘和’；而西方思维强调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强调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关于“世界文学”等问题的反思”4）。这种对中西文化本源差异的深刻把握，为其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

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外国文学教学及其世界文学研究的工作，就是要通过不同文本间的比较，来揭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思维底蕴。他将思维差异大致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思维差异、传统与现代思维的差异，以及不同学科领域间的思维差异。这种分类为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图。例如，在阐释第一种差异时，刘建军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注重伦理和道德价值的社会，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无一不和伦理道德的价值指向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16）。他论述了关于财富观的案例。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主张的是勤恳劳动，集腋成裘，通过自己持续不断的诚实劳动来聚集和占有财富；但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占有财富的方式是通过冒险和经营去获得财富；而在阿拉伯文学作品中，如《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和《一千零一夜》中的辛巴达故事，财富则常常是偶然得到的，体现了乞求一夜暴富的观念。²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本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文化观念的深刻差异。这种中外比较研究与跨文化视角，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也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使学生在學習文学的同时，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思维训练。

1 参见刘建军：“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教育》2（2023）：3-12。

2 参见孙霄、刘建军：“关于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刘建军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2023）：1-17。

三、实践路径：新时代教学改革系统探索

刘建军的教学思想并未止步于理论建构，而是深入到教学实践的每个环节，从教材体系、课堂模式、教学原则到评价机制，都进行了一场系统性的深刻变革。具体而言，刘建军倡导将文本精读与文学史脉络相结合，以人文领域的新倡议系统化重构文学研究，避免技术融合导致的思维碎片化，最终达致从专业能力到人生智慧的升华。

（一）“双教材”模式与文本细读的深度融合

刘建军认为，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应首先从教材改革着手。针对长期以来教学中重文学史、轻作品分析的倾向，他认为“大学外国文学教学应该以‘双教材’模式进行（……）把‘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作品选’作为同等重要的教材看待”（“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¹¹）。这一模式要求将《外国文学作品选》与《外国文学史》并重，课堂教学应聚焦于文本细读与情感审美分析，而将文学史知识作为课下补充。这一调整看似简单，实则是对教学重心的根本性转移，它将学生从对文学史知识的被动记忆，拉回到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主动感受与深度思考之中，让文学课堂重新充满了审美的魅力与思想的活力。

这一教学理念并非停留在理论倡导，而是被他完整地贯彻到了教材编写的实践之中，实现了理论建构与教学资源的同步创新。他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学》等十多部全国统编教材，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些教材并非传统知识的汇编，而是将问题意识和跨文化视角深度融入其编写体例与章节设计之中，从而为全国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创新性的教学资源。通过这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材，他的教学理念超越了单一课堂的局限，影响了更广泛的学生群体，在外国文学教育领域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

与此相应，课堂上的作品分析也亟待革新。刘建军批判了遵循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故事情节、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征的八股式讲法。¹认为这种模式较为僵化，遮蔽了文学的特殊性。他主张“改变以往那种文学史教材中的作品讲授模式，集中精力去分析文本的情感特点以及在审美中体现的思想价值”（“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¹²），并借此融入问题意识。这种转变意味着，教师的角色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学生进入文本世界的引导者，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激发学生去感受语言的温度、体察情感的流动、洞察思想的深度。刘建军认为“今日理想的‘世界文学’，其实就应该体现现代价值观的统筹性与文学样态丰富性的高度统一”（“关于‘世界文学’等问题的反思”¹³³）。此外，他还倡导跨学科视野的融合，例如注重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结合，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的交错融通，为学生提供全新的研究工具和思考维度，使文学研究能够与时代前沿科技同频

1 参见刘建军：“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教育》2（2023）：3-12。

共振。

（二）“回到文本”与“跳出文本”的辩证统一

刘建军提出了“回到文本”又“跳出文本”的辩证教学原则，这构成了其教学实践中极具张力的方法论核心。这一原则旨在解决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完全脱离文本的空泛理论演绎，二是拘泥于文本内部而与社会现实隔绝的象牙塔式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在文本的深度与现实的广度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所谓“回到文本”，是指文学研究的结论必须牢固地根植于文本本身。刘建军特别强调，“无论是文学的经济学研究，还是文学的法学研究乃至文学的符号学和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的见解等等，说到底，都是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也是我们从文本中得来的。换言之，这些跨学科的观点和认识是文学家乃至批评家理解的产物，而不能反过来变成文学家与批评家演绎其他学科的思想和主张”（孙霄 刘建军 16）。伟大的文学文本都是通过经典的细节（或意象）或场景（情境）来对社会生活加以认识和反映的。因此，文学的细节和具体场景的描写中，蕴含无限的阐释空间。这种对文本本体性的坚守，确保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防止其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庸或注脚。

然而，仅“回到文本”并不足够，还必须“跳出文本”，即把文学研究和社会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通过文学文本的研究来表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见解。文学的价值最终要在其与现实的对话中得以彰显。在教学中，刘建军擅长运用类比手法，如将《老人与海》中老人的捕鱼经历与学生大学时代的读书学习相类比，揭示两者在精神追求上的共通性，从而使经典文学文本焕发当代意义。这种方法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培养了他们将文学思考融入生活实践的能力，真正实现了文学教育知行合一的终极目标。

（三）以人文领域的新倡议系统化重构文学研究

刘建军认为“新学科建设的本质是建立适应 21 世纪发展所需要的中国人才培养新模式，而不是简单的、所谓的‘教学改革’模式”（“‘新文科’抑或‘新学科’” 23）。在这一背景下，外国文学领域大力提倡的“文学+”研究，其初衷无疑是富有价值的。刘建军强调“这种主张对打破原有知识体系的栅栏和禁锢，毫无疑问是富价值的”（孙霄 刘建军 5）。然而，他敏锐地指出，真正的跨学科融合绝非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化学反应。若只是简单地把其他学科零碎、肤浅的知识强行加入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会使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变成了各学科不完整知识的拼盘。“我们今天不能再陷入潜在形成僵化的‘文学+’的新的‘固化模式’之中，从而抛弃了文学研究自身的特殊性和研究的科学性”（孙霄 刘建军 5）。

关于新文科的真正挑战与机遇究竟何在？刘建军指出答案深植于文学样态自身的演变之中。他认为“文学样态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是同步的。如果说故事、戏剧、歌谣等是适应古代文盲普遍存在现实的主要文学形式，那么

表现个人独特精神的小说、抒情诗等则是近代社会的主要形式，而多媒体创作和多模态文本就是我们今天科技大发展的产物。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作用下，文学已经成为多模态的一种存在，这表明了文学自身内涵和外延的深刻变革”（孙霄 刘建军 7）。这种变革必然要求对文学研究的知识系统进行整合与重构。多模态文本是交融着个人智慧、众人情感和多种现代智能技术手段的产物，不是用所谓的“文科+”的简单化做法能够解决的。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能够同时处理代码逻辑、叙事结构与审美体验。因此，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也要从艺术形式的新模态入手，系统地、有针对性地研究这些问题，才是真正打破学科栅栏、推动学科发展的有效路径。¹

（四）从专业能力到人生智慧的升华

刘建军高度重视外国文学教学与人才培养，他主张将教学目标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进一步深化到从能力到智慧的激发。这标志着一种教育境界的跃升，即从培养会做事的专业人才，转向塑造会思考的智慧个体。他认为，能力是达成智慧的基础，主要由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构成，一是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因为真正的创新与洞见，往往源于对一个领域现有范式或未言明前提的质疑，而非在既定框架内进行技术性的解答。二是培养学生通过表象深入认识事物本质。刘建军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表象和本质构成的。在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发展、人物行为活动以及场景描写等，都是显性的或表象的，而在其背后则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或人性的本质。这种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穿透力，不被故事的表面所迷惑，而是要挖掘其深层结构。²三是培养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刘建军批评了当前研究和教学中用一个抽象的、恒定的概念或标准去解释具体问题的倾向。正如一千个人眼中之所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因为人们把它放在不同的条件下才导致看法的差异。这要求学生具备高度的情境敏感性，懂得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文学现象。四是培养学生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力。刘建军辨析了中西方在“矛盾”观上的根本不同：西方人更强调矛盾构成中的“对立”和“斗争”，主张“一方战胜另一方”；而中国的哲学则告诉我们，“矛盾”虽然是由“对立的统一”构成的，更强调其动态平衡与相互转化。³

这四种能力的综合，最终将走向“智慧”的阶段，以适应智能社会对人文素养的高阶需求。智慧并非能力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复杂情境中综合运用各种能力，做出审慎、深刻且富有远见的判断。正如刘建军主张的要“把本专业的教学从单纯的外国文学知识传授、能力的培养深化到从‘能力’到‘智慧’的激发上来”（“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9）。

1 参见 孙霄、刘建军：“关于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刘建军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2023）：1-17。

2 参见 刘建军：“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教育》2（2023）：3-12。

3 参见 刘建军：“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教育》2（2023）：3-12。

刘建军的教学思想体系，不仅是对中国外国文学教学不断探索的深刻总结，更是在全球化与智能社会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为学科未来发展所绘制的系统性蓝图。其思想内核，始于对“中国的外国文学”这一学科主体性定位的深刻自觉，立足于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在此基础上，他以“问题导向”为引擎，驱动教学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到“思维训练”的根本性范式转换。这一思想体系并非悬于空中，而是完整地贯穿于教材编写、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他主编了十余部外国文学相关教材，将问题意识和跨文化视角融入教材体系，为全国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创新性的教学资源，通过这些教材，他的教学理念影响了广泛的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推动了外国文学教学的长足发展。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前理事长，刘建军通过学术活动、人才培养、教材编写和公共学术讲座等多种渠道，深刻影响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格局与发展方向。尤为可贵的是，刘建军的思想体系展现了一种深刻的辩证智慧与前瞻性视野。他既倡导跨学科融合，又警惕“文学+”可能带来的新的思维固化；他既强调文学研究的本体性，又巧妙地将其与价值引领融为一体，实现了专业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

Works Cited

- 李维屏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外国文学研究四人谈”，《山东外语教学》4（2024）：1-8。
 [Li Weiping et al.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terature Studies: A Panel Discussion.”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4 (2024): 1-8.]
- 刘建军：“‘中国意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关键所在——以《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史》的写作为例”，《外国文学研究》5（2024）：19-23。
 [Liu Jianjun. “‘Chinese Consciousness’ as the Prerequisite and Key to Constructi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Writing *Byzantium: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24): 19-23.]
-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构建”，《外国文学研究》4（2014）：14-18。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14-18.]
- ：“‘新文科’抑或‘新学科’：兼论新文科视阈下外国文学教学改革”，《当代外语研究》3（2021）：21-28。
 [—, “‘New Humanities’ or ‘New Discipline’: A 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oreig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Humanitie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3 (2021): 21-28.]
- ：“论‘中国的外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4（2023）：107-117+150。
 [—,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4 (2023): 107-117+150.]

- ：“新挑战视域下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教育》2（2023）：3-12。
- [—.“The Reform of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hallenges.” *Language Education* 2 (2023): 3-12.]
- ：“关于‘中国化’概念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兼论外国文学乃至具体学科‘中国化’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18）：1-11。
-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Sinicization’ and the Relevant Issues: Study on the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Specific Discipline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2018): 1-11.]
- ：“关于‘世界文学’等问题的反思”，《外语与外语教学》1（2018）：130-135。
- [—.“Rethink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Discontent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 (2018): 130-135.]
- 孙霄、刘建军：“关于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刘建军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2023）：1-17。
- [Sun Xiao and Liu Jianjun. “Some Thoughts on Establishing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u Jianju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1 (2023): 1-17.]